

北地郡始平郡新平  
北郡唐京兆府京兆  
府杂制长安志卷第  
京郡京兆尹府县官  
卷第三官室一周秦  
安志卷第四官室二  
安志卷第五官室三  
汉献帝晋司马氏前  
秦苻氏后秦姚氏西  
后周宇文氏长安志  
官室四唐上长安志  
唐皇城唐京城长安  
唐京城二长安志  
唐京城三长安志卷  
京城四长安志卷第  
一万年长安志卷第  
二长安长安志卷第  
三咸阳长安志卷第  
四兴平武功长安志  
具五临潼鄠县长

西安经典旧志稽注

# 长安志

〔宋〕宋敏求撰

# 长安志图

〔元〕李好文编绘

阎琦 李福标 姚敏杰 校点

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 
三秦出版社

西安经典旧志稽注

阎琦 李福标 姚敏杰 校点

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

# 长安志

〔宋〕宋敏求 撰

# 长安志图

〔元〕李好文 编绘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 
三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安志·长安志图 / (宋) 宋敏求撰, (元) 李好文编绘;  
阎琦, 李福标, 姚敏杰校点. — 西安: 三秦出版社, 2013. 12  
(西安经典旧志稽注)  
ISBN 978-7-5518-0605-3

I. ①长… II. ①宋… ②李… ③阎… ④李… ⑤姚…  
III. ①长安(历史地名)—地方志 IV. ①K294.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5347号

## 西安经典旧志稽注 长安志·长安志图

[宋] 宋敏求 撰

[元] 李好文 编绘

阎琦 李福标 姚敏杰 校点

责任编辑 高峰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 
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

电话 (029) 87205121

邮政编码 710003

印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

开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 38

字数 556千字

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

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2200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18-0605-3

定价 230.00元

网址 <http://www.sqcbs.cn>

# 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

主任 董 军

副主任 段先念 何 元 周爱全 冯艳阳

委 员 秦鸿学 张建政 愈树平 薛振虎 夏泽民

乔安涛 曾松林 雷英杰 李颖科 张新民

王尊敬 罗亚民 严 石 张印寿 苗宝明

任立新 冯慧武 张永科 吕恒军 严 彬

刘顺智 李利民 尤晓民 王军平 王作权

郝小奇 李长安 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

王 莹 文启湘 陈国庆 甘枝茂 王双怀

张应超 牛 昉 康志祥

## 西安地情资料丛书编委会

主 任 冯艳阳

副主任 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

委 员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

张 耀 杨军亚 姚文东

高 鹏 高长安 崔义萍

崔桂琴 富小云 彭栋为

## 校点前言

北宋熙宁年间宋敏求编撰的《长安志》，先总叙自先秦以至唐代长安的历史沿革、区域变化、面积、人口、土产、土贡、风俗等基本情况，后分叙长安城的城坊宫室、第宅寺观，以及京兆府所属二十四县的沿革、山川、名胜、古迹等，详近而略远，体大而思精，为后世研究唐及唐以前长安的历史、地理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。然而此书流传至今，各本在文字上多有歧异、讹脱之处，读者在阅读和研究中未免有疑惑，甚至感到无所适从。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把《长安志》列入旧志整理的重点项目，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。为此，我们花了近两年时间从事于此书的校点整理工作。工作的细则和经历，我们已在校点“凡例”中作了交代。下面，主要谈谈校点过程中的一点体会。

### —

地方志作为记录一地自然、社会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，具有“资治、教化、存史”的功能，故自赵宋以后，历代官方都热衷于修志。据《中国古方志考》统计，宋代地方志约有700余部<sup>[1]</sup>，惜其绝大部分已散佚不存，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著录

[1] 张国淦编著《中国古方志考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版。

留存于世的宋代方志，只有5部总志和28部郡县志<sup>[1]</sup>。这种情况起码在清乾隆时即如此，且“皆南方之书，北方惟有此《志》（即《长安志》）与于钦《齐乘》耳”<sup>[2]</sup>。《长安志》并非官修之书，乃是积编撰者宋敏求一家之力而成就的。它属于方志中的专志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都志，其“资治”、“教化”的色彩并不浓厚，而“存史”的功能最为明显。具体说来，它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
### （一）内容广博

一直以来，许多学者都称《长安志》是以唐代韦述《两京新记》（长安记部分）为基础扩衍而成的。其实，这一说法并不严谨。日人福山敏男据《两京新记》第三卷残卷的记载和学者们辑佚的有关内容，推测《两京新记》各卷内容依次是：卷一为京师及宫城、皇城、禁苑，卷二为京城及万年县所领诸坊，卷三为长安县所领诸坊，卷四为东都总说及宫城、皇城、东城及诸坊，卷五为诸坊。<sup>[3]</sup>可见，宋敏求《长安志》在内容上对《两京新记》的继承，仅仅体现在卷六至卷十“唐皇城”和“唐京城”部分的基本构架上，而其他各卷内容为《两京新记》所无。

《两京新记》只能说是《长安志》的一种重要参考文献。

《长安志》中许多更为细致具体的内容，来自宋敏求对其他各类史书、地志资料的广泛阅览和搜采。其叙述的笔触也前后伸缩，上下求索，对《两京新记》之“新”作了彻底的深化。《长安志》开篇，总述长安自先秦至唐，乃至“本朝（北宋）”的历史、分野、土产、土贡、风俗、管县等。而“管县”一项，记述尤详。自第三卷起，以迄第十卷，记载宫室城坊，也是远追周

[1]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版。

[2] 毕刻本《长安志》卷首王鸣盛《新校正长安志序》。

[3] [日]福山敏男《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》，《福山敏男著作集》之六《中国建筑と金石文の研究》，中央公论美术出版，1982年版，170页。

秦，详其沿革。单就卷六至卷十的“唐皇城”和“唐京城”部分，也详记其来龙去脉，及官方、土俗的各种说法。对韦述之后的唐宫室城坊的变化，所记尤多。其所增加的内容，以征引史志文献用资参证者为多，另有历史事件、轶闻等，例以小字注的形式出之，随处可见。如卷七“唐皇城”记“大兴善寺，尽一坊之地”，有小字注如下：

初曰遵善寺，隋文承周武之后，大崇释氏，以收人望。移都先置此寺，以其本封名焉。神龙中，韦庶人追赠父玄贞为酆王，改此寺为酆国寺。景云元年，复旧。《酉阳杂俎》曰：“寺取大兴城两字、坊名一字为名。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，岁旱时，官伐其枝为龙骨以祈雨。盖以三藏役龙，意其枝必有灵也。东廊素和尚院，庭有柏四株。元和中，卿相多游此院。柏至夏有汗，污人衣如鞣脂，不可浣。招国郑相恶其汗，谓素曰：‘弟子为伐此树，各植一松也。’及暮，素戏祝曰：‘我种汝三十馀年，汝以汗为人所恶，来岁若复有汗，我必薪之。’自是无汗。素公不出院，转《法华经》三万七千部，夜常有貉子听经，斋时鸟鹊取掌中食。天王阁，长庆中造。本在春明门内，与南内连墙。其形高大，为天下之最。太和二年，敕移就此寺。拆时腹中得布五百端，漆数十筒。”

其内容之丰富，于斯可见。《两京新记》的体例自然是限于“新”的，而《长安志》显然从“博”字上做了不啻数十倍于《两京新记》的工夫。

《长安志》还花了大量篇幅，详细记载了京兆府所辖的万年、长安等二十四县的地理信息，对《两京新记》之“京”字作了大幅度的拓展。其叙述包括二十四县的废置沿革、治乱兴衰、县境、乡镇村里多寡及其位置、社坛、驿站、山谷、关隘要道、军事基层组织、水系在各县的流布、水利设施、津渡桥梁、湖泊泉池、生产活动、物产土贡、宫殿苑囿、台阁、寺观、陵墓园林



等。清·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赞云：“长安为周、秦、汉、唐建都作邑之所，事迹丰夥，记载宜详。次道以唐韦述《两京记》但详于古迹，余多阙而未备，乃创为体例，遍搜传记诸书，汇次成书，旧都古今之制，于是乎备。”<sup>[1]</sup>它确为后世研究长安地区的历史地理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参考资料。

## （二）征引宏富

征引宏富，这一点应该是读者对《长安志》的第一印象。《长安志》编撰者宋敏求（1019-1079），字次道，赵州平棘（今河北赵县）人。进士及第，官至史馆修撰、龙图阁直学士。著述宏富，曾补撰唐武宗李炎以下六朝实录，编集《唐大诏令集》，并预修《新唐书》。其都邑地志方面的撰述还有《河南志》二十卷，《东京记》三卷，均已亡佚。宋敏求一生的活动主要是在当时的都城开封府，虽然也曾外出做官，到过西京（今河南洛阳）和亳州、绛州等地，但其游踪却从未越过崤函，更未能亲临长安故地以作实地考察。可以说，《长安志》的编撰是完全依托于文献搜览而成的。

作为当时著名的历史、舆地学家，宋敏求博古通今，对唐代典章制度、政治历史、官吏治绩、人物事迹、疆域政区、两京建设，以及文化经济状况等都颇为精通，故他驾驭文献的能力自然是超于常人的。其家累世积书，至父绶时，藏书有两万卷之多。敏求又多方寻求，家藏增至三万馀卷。大致说来，宋氏所藏内容丰富，多杨徽之、宋绶手泽及四朝赐札，另有自宋初至神宗熙宁年间的报状，而藏唐人诗集最为完备。晁以道曾称：“惟是宋宣献家四世以名德相继，而间有毕丞相、杨文庄二家之书，其富盖有王府不及者。”<sup>[2]</sup>敏求不仅藏书数量多，“退朝则与子侄繙

[1] 清·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补逸卷十二，民国十年（1921）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。

[2] 宋·晁说之《嵩山文集》卷十六《刘氏藏书记》，民国影印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本。

讎校订，故其收藏最号精密。”<sup>[1]</sup>当时的一些名臣士大夫与之交游，多向他借书，其中不乏欧阳修、刘恕、王安石这样的当世名公巨卿。朱弁《曲洧旧闻》卷四载：“宋次道龙图云‘校书如扫尘，随校随有’，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，世之蓄书，以宋为善本。居春明坊，昭陵时，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，以便于借置故也。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直常高一倍。”<sup>[2]</sup>其书满家，不仅使他家旁边的出租屋价格上扬，更为他在编纂《长安志》过程中搜集文献提供常人难以企及的方便。

赵彦若在《长安志》序中说：宋敏求编纂《河南志》的同时，就开始“有意于搜采”有关长安的资料了。二十几年之后，“穷传记诸子钞类之语，绝编断简，靡不总萃隐括而究极之”<sup>[3]</sup>，乃创属体绪，纒次其言，上下浹通，为二十卷。宋敏求在撰述中查考征引了大量的文献。据粗略统计，《长安志》全书共征引文献百余种，从儒家经典到图经地志、史书诗文、诏令奏疏，靡不具备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在《长安志》征引书之中，流传至今的常见书大约30种，仅占征引书总数的27%；今已不传的佚书竟有55种，占征引书总数的50%。<sup>[4]</sup>可见，《长安志》在保存古代文献方面也有重要的价值。

历来学者对宋敏求在《长安志》编撰中的征引之富，赞誉有加。如李直在为《輿地纪胜》作的序中亦言：“最有可称者，唐丽正殿直学士韦述《东西两京新记》及本朝龙图阁直学士宋公敏求《长安》、《河南》二志尤为赅赡精密。”<sup>[5]</sup>晁公武称道

[1] 宋·苏颂《苏魏公文集》卷五十一《龙图阁直学士修国史宋公神道碑》，清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刻本。

[2] 宋·朱弁《曲洧旧闻》卷四，清乾隆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。

[3] 毕刻本《长安志》卷首赵彦若《长安志序》。

[4] 参见魏喜娥《宋敏求〈长安志〉引书钩稽》，东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。

[5] 宋·王象之《輿地纪胜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影印《宋元方志丛刊》本。

说：“因韦氏所记，搜采群书，罔有遗佚。”<sup>[1]</sup>陈振孙曰：“二书凡例微不同，然汉唐旧都遗事详矣。”<sup>[2]</sup>马端临曰：“长安志十卷。……凡府县之政，官尹之职，河渠关塞之类，至于风俗物产，宫室道街，无不详备，世称其博。”<sup>[3]</sup>毕沅校注《长安志》，其动因之一亦是因为此书可补史载之不足。如对于宋开宝元年兴建历代帝庙之事，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均为寥寥数语，一笔带过，而《长安志》卷一收有开宝元年建汉文帝庙诏书全文：

建汉文帝庙，去霸桥镇二十里；景帝庙，去中桥镇十五里；宣帝庙，去巡镇二十里。今本府各移镇就庙安置，镇将句当洒扫。又，周武王庙，在咸阳县郭下；汉高祖庙，去长安县四里；武帝庙，去咸阳县五里；唐太宗庙，去醴泉县三百二十步；肃宗庙，去甘北巡镇三里余。县令、主簿句当洒扫。又，周文王庙、成王庙，各去咸阳县一十五里；康王庙，去咸阳县六里；秦始皇庙，去昭应县一十里；后周太祖庙，去富平县镇一十三里；耀州唐高祖庙，去三原县镇一十八里；宣宗庙，去云阳县镇四十里。今移县就庙，县令、主簿句当洒扫。若舍屋摧毁，当议勘断。令吏部铨曹，应上任、罢任交割，批书历子，如批到“舍屋摧毁”，未得与官。不批者，仰铨曹牒问本州。如庙宇不曾摧毁，即依长安定格漏批例，殿降其镇将。若致舍屋摧毁，当议决断勒停。

此诏书详细记载事情过程。故毕沅感叹《长安志》“此书收残补剜之功为不小矣”<sup>[4]</sup>。

### （三）体例严明

关于宋代方志在体例上的发展和定型，现在学界都以宋代

[1] 元·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卷三十一引，明万历刻本。

[2] 宋·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八，清乾隆武英殿聚珍本。

[3] 元·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卷三十一，明万历刻本。

[4] 毕刻本《长安志》卷一末毕沅按语。

三部志书的出现作为其重要标志，即北宋太平兴国时期乐史纂《太平寰宇记》、南宋嘉定年间高似孙撰《剡录》、南宋周应合纂《景定建康志》。它们在体例上敢于打破旧格局，增设人物、艺文、县志纪年等栏目内容，为论者所称道。出现在北宋初期熙宁年间的《长安志》，虽是从私家地记、图经向官修方志转型时期的作品，但方志体例的完备和定型在此《志》中已经有所体现了。从其内容安排上看，自卷一至卷二设总叙、分野、土产、土贡、风俗、四至及管县等栏目，介绍长安的概况。管县又从汉、后汉、晋、隋、唐以至宋朝按时代分州郡分述。对于不便在以上各栏目中介绍的其他重要内容，或不甚重要而又不忍舍弃的资料，则设“杂制”以存之。又设“京兆尹”、“府县官”等栏目，介绍长安历代重要政治人物。

自卷三至卷十，介绍长安历代宫室街坊的兴替变化。其“详近而略远”的原则，突出体现在“唐皇城”和“唐京城”的内容叙述上。“唐皇城”按照唐代皇城各城门名称、方位、规制及周围的寺庙、官府、宫室等机构设置状况，逐一由方位来记述。

“唐京城”记述了唐代长安城的历代沿革、规模、各城门名称、外城、坊间、街道、宫殿建筑，以及分布于各坊间的官员名人府第、寺观、祠堂、府廨、家庙、市井等，真可谓“靡不备具”。

卷十一至卷二十，介绍长安下辖的二十四县的基本情况。

《长安志》是以皇城、京城为中心，由内向外扩展到对二十四县的介绍。二十四县的安排，同样是按离长安的远近距离，由近而及远的。而对每一县地介绍，也是严格遵循由远及近、详近略远的原则的，总以唐代为主，细致入微，由县而及乡、由乡而及社坛、镇、村、里、驿、桥、渡、山、原、丘、坡、堆、川、坞、谷、水、漕河、渠、池、江、陂、道、亭、聚、故城、宫殿、观、寺、陵庙、墓冢等。总体看来，《长安志》综合了宋前郡书、地记、政纪、人物记、风土记、古迹、谱牒、文征、都邑簿

的传统体例，又加以自己的新创，为方志体例的完善和定型做出了卓绝贡献。王鸣盛《序》称：“长安汉唐都邑所在，事迹尤夥，记载尤宜加详，宋氏此编，纲条明析，瞻而不秽，可云具体。”<sup>[1]</sup>使人“开编粲然，如指诸掌”<sup>[2]</sup>。

当然，《长安志》在内容安排及叙述上难免有其不足之处。程大昌在《雍录序》中评《长安志》云：“宋之此《志》，引类相从，最为明悉。然而细细校之，亦不免时有驳复也。且如曲台既入未央，而又入诸三雍，是分一为二也。长门宫在都城之外长门亭畔，而列诸长信宫内，则失其位置矣。诸如此类，岂可苟随无所可否也！况宫殿苑囿也者，又多空存其名，不著事则无可寻绎矣。”<sup>[3]</sup>这固然都是宋《志》的错漏之处，然瑕不掩瑜，“实则凌云之材，不以寸朽为病也”<sup>[4]</sup>。而“程大昌《雍录》，好发新论，穿凿支离，不及宋氏远矣”<sup>[5]</sup>。不“好发新论，穿凿支离”，严格把握行文叙事的分寸，这本身就是《长安志》体例严谨的一种反映。

#### （四）记述精确

《长安志》对于长安的地理位置、地形特点和山川形势等地理因素的叙述极为精确。如周丰、镐故事距宋敏求之世已有二千年，早已泯没无闻于世。宋敏求依据大量资料，论证丰邑位于泮河西岸，镐京位于泮河东岸，两者相距二十五里。这为后世的考古发掘提供了线索。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丰镐遗址区发现了车马坑和板瓦，证明宋敏求记载的方位是不错的。

据李健超先生撰文称：《长安志》卷七记载唐皇城南面三门，正南曰朱雀门，东曰安上门，西曰含光门；西面二门，南曰顺义门，

[1] 毕刻本《长安志》卷首王鸣盛《新校正长安志序》。

[2] 司马光《温国文正公文集》卷六十五《河南志序》，民国影印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[3] 宋程大昌《雍录》卷首，中华书局，2002年黄永年点校本。

[4] 清纪昀等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七十，清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内府刻本。

[5] 毕刻本《长安志》卷首王鸣盛《新校正长安志序》。

北曰安福门。1983年西安市修建环城路时，除安上门和顺义门分别被覆盖在今西安城南门和西门之下外，朱雀门、含光门和安福门的遗址均被发现。考古工作者并对含光门进行了发掘清理工作，按《长安志》的记载，这些唐皇城南面和西面城门门洞数和使用情况均与之完全相符。又，《长安志》卷九靖恭坊工部尚书杨汝士宅条注文云“与其弟虞卿、汉公、鲁士同居，号‘靖恭杨家’，为冠盖盛族”。杨氏是弘农名门大族，从杨虞卿之父杨宁开始，莹域在洛阳北邙山。1949年前在洛阳城北先后出土了杨宁、杨虞卿之子、子妇、孙子等五处墓志，均标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长安靖恭坊，<sup>[1]</sup>这些墓志的出土，证明“靖恭杨家”确为“冠盖盛族”。又，《长安志》卷九太平坊西南隅温国寺，有注文“本隋实际寺，隋太保薛国公长孙览妻郑氏舍宅所立，景龙元年殇帝为温王，改温国寺，大中六年改崇圣寺”。实际寺曾经是高僧鉴真和尚受具足戒的一座名寺。据《长安志》所载方位，恰在今西北大学校园之内。1982年西北大学南门内西侧兴建宾馆饭厅时，在地下发现大量寺庙遗物，有贴金石经幢碎片，贴金浮雕佛像、善业泥等。虽然没有文字说明这些文物是实际寺（温国寺）的遗物，但在这里发现寺庙遗物绝不是无缘无故的。又，《长安志》卷十修德坊西北隅兴福寺，注文“本右领军大将军彭国公王君廓宅，贞观八年太宗为太穆皇后追福，立为弘福寺，神龙中改为兴福寺。……太宗时广召天下名僧居之。沙门玄奘于西域回，居此寺西北禅院翻译。寺内有碑，面文贺兰敏之写金刚经，阴文寺僧怀仁集王羲之写太宗圣教序及高宗述圣记，为时所重”。玄奘在弘福寺翻译佛经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记述详细。怀仁集王羲之太宗圣教序碑，今藏西安碑林，但已无贺兰敏之写《金刚经》。弘福寺遗址在哪里？1982年3月中旬，西安电瓶车制造厂修建地下排水管道，于大门外1.5米处地下约1米

[1] 均见洛阳市新安县千唐志斋管理所编《千唐志斋藏志》，中国旅游出版社，1989年版。

发现《大唐弘福寺故上座首律师高德颂碑》，首律师俗姓皇甫，朝那人，舍化于贞观九年朱明月，显庆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立碑，许敬宗撰文，郭广立书。碑已伏，面上，头南，似无移动位置。碑石出土地点在今西安火车西站正北，南距铁路线约30米，按《长安志》所记方位和里程，此地正是长安城修德坊西北隅。李健超先生并称：

《长安志》中所记的某人某坊里的宅第，有些不仅有唐代文献资料可资佐证，解放前后，出土的墓志更证明了这一点。<sup>[1]</sup>

在记述长安所辖二十四县的乡里村镇时，对其方位和道里的记载也是详明不苟的。这一点，只要翻阅《长安志》即知，无需多加赘语。

《长安志》作为一部难得的地方志著作，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。元明清之际后人多仿其体例，借其资料撰述古长安城的著作。如元朝骆天骧采用《长安志》的资料，削繁就简，以类排次，并增添金、元时事，编成《类编长安志》十卷。元代李好文著有《长安志图》三卷（一名《长安图说》），在《长安故图》的基础上编成二十二图，常被附刻于宋敏求《长安志》。这次校点《长安志》，即依此例。明末清初顾炎武《历代帝王宅京记》叙历代建都之制，上起伏羲下迄于元，征引赅洽，考据精审，实亦仿《长安志》、《雍录》等体例。清·徐松撰《唐两京城坊考》，其中长安部分完全承袭了《长安志》的体例和内容，只是略加增补、考订而已。当代学者如李健超、辛德勇等对长安历史地理文化的研究，也多是建立在对《长安志》的研究基础之上的。

## 二

北宋熙宁年间宋敏求撰《长安志》，无图。不久，京兆蓝

[1] 《增订唐两京城坊考》李健超自序，三秦出版社，2006年修订版。

田人吕大防完成《长安图记》一卷，并刻碑立于其衙署内（后经金、元战乱，图碑毁佚，至清代残石出土，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）。然而吕图与《长安志》并无关联。<sup>[1]</sup>元·李好文编绘有《长安志图》三卷，其核心部分就是根据吕图加以订补而成的。卷首有李好文自序称：“图旧有碑刻，亦尝钺附《长安志》后，今皆亡之。有宋元丰三年，龙图待制吕公大防为之跋，且谓之《长安故图》，则此图前世固有之。其时距唐世未远，宜其可据而足征也。”此言不可信，因为除了李好文这段话之外，再也找不到任何《长安志》附刻有《长安故图》的信息。其实，吕大防为之跋的《长安故图》是吕氏自绘的。

李好文，字惟中，自号河滨渔者，元大名东明（今山东东明）人。至治元年（1321）以明经登进士第，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著述颇富，并参与修辽、金、宋三史。至正元年（1341）、至正四年（1344）两次到陕西担任西台治书侍御史。《长安志图》就是在陕西任职期间编绘而成的。今传本《长安志图》卷端署“元河滨渔者编类图说，元张敏同编校”。河滨渔者，即李好文号；张敏，元泰定四年（1327）进士，自号月山山人。<sup>[2]</sup>

李好文《长安志图》自序称：《长安故图》“或有后人附益者，往往不与《志》合，因与同志较其讹驳，更为补订，厘为七图。又以汉之三辅及今奉元所治，古今沿革，废置不同，名胜

[1] 辛德勇先生《考〈长安志〉〈长安志图〉的版本——兼论吕大防〈长安图〉》一文认为“吕大防在题记中没有提到《长安志》，应当是由于当时他还没有见到《长安志》的缘故。因为《长安志》成书于神宗熙宁九年，下距吕大防制《长安图》成不过三年多时间，恐怕还没有能流布开来。如果吕大防依据的这份底图是出自宋敏求《长安志》的话，对于当代名公刚刚刊刻的地图，他是绝不会呼之为‘旧图’或‘长安故图’的，而应注明依据的是宋敏求新作。这一点可以补充证明上文所说的成化、嘉靖两个本子的李好文自序作‘则是前志图固有之’是舛讹的。其实这个‘长安故图’也是宋敏求《长安志》所依据的一项重要资料，《长安志》尚引有数条佚文。”（此文收入辛德勇《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1996年版，329页）。

[2] 清·樊增祥修、谭麴纂（光绪）《富平县志稿》卷五《人物·乡贤·元》，清光绪十七年刻本。



古迹，不止乎是；泾渠之利，泽被千世，是皆不可遗者，悉附入之，总为图二十有二，名之曰《长安志图》，明所以《图》为《志》设也。”李氏补订的这七幅图包括：汉长安故城图、唐宫城坊市总图、唐禁苑图、唐大明宫图、唐宫城图、唐皇城图、唐京城坊市图，是《长安志图》的核心部分。当然，李好文在重绘时参据了许多对汉唐遗迹的实地调查结果，有些地方又为了迁就《长安志》等文献的说法，甚至对吕图做了误改，已非吕图原貌。

除了这七幅地图外，其他图幅也大多是李好文依据有关图刻改编的。如卷上《唐骊山宫图》三幅、卷中《唐昭陵图》二幅、《唐建陵图》和《唐乾陵图》各一幅，总共七幅图，都是出自北宋游师雄的石刻地图；其余《汉三辅图》、《太华图》和《咸阳古迹图》出处不详，《奉元州县图》和《奉元城图》为当时事，当有图册可依，也可现行编制。《城南名胜古迹图》，虽与吕图有一定关系，但与北宋张礼《游城南记》的关系似更紧密。

《长安志图》卷下《泾渠图说》部分只有两幅有关泾渠的水利图，与《长安志》则关系更远，其体例也与上中两卷不同。辛德勇先生联系今传各本在《图说》目录下夹注“《图说》本《长安志图》之下卷也。以其记录额多，且泾渠利民为大，故自为一编，书凡六篇，图二。今列其目，以便观者”的话，认为《泾渠图说》有“自为一编”的单刻本行世，只不过李好文不忍从《长安志图》中割弃之，“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即雕一个版而同时装印两部书。一部题为《泾渠图说》单行，给专意关心泾渠水利的人来看……一部仍作为《长安志图》的下卷，就是明成化本和嘉靖本《长安志图》的样子。为了单刻本的需要，也才专门请必申达而写了一篇序文放在前面。《图说》目录下面注云本《长安志图》之下卷，当然也是考虑便利单刻本才加上的，这一部分的其他版面形式也都主要是从方便单刻的考虑出发设置